

主 编 王晓玉
副主编 仲富兰 赵抗卫

Papers of Dissemination Research

传播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
叶
籍
出
版
社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编

③

主 编 王晓玉
副主编 仲富兰 赵抗卫

Papers of Dissemination Research

传播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学研究集刊. 3/王晓玉主编;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
ISBN 7—5325—4034—0

I. 传... II. ①王... ②华... III. 传播学—丛刊
IV. G20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8424 号

传播学研究集刊(3)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编

主编 王晓玉 副主编 仲富兰 赵抗卫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总发书处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上海颀辉装订厂装订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25 插页 2 字数 289,000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

ISBN 7—5325—4034—0

G·379 定价:35.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传播学研究集刊》理事会名单

(按单位名称音序)

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广西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南京太阳海文化公司

青岛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

上海电台文艺频率

上海新大陆文化传播公司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传播与媒介理论·

对阅听人实证传统和批判传统的思考	童静蓉 1
传播政治经济学对西方媒介及其功能的批判	
——从政府、企业与媒介的关系出发	刘晓红 13
关于全球媒体巨头“触网”经历的理性思考	殷晓蓉 19
社会弱势群体媒介使用权当议	刘立刚 27

·新闻传播研究·

论地方媒体经济报道的功能拓展	杨秀国 39
状态新闻浅议	刘友杰 46
非母语文字阅读距离引发的装饰美	黄 佶 53
新闻标题语句分析	蒋冰冰 60
政务信息走向透明: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特征初探	江 宇 65

·传播史研究·

试论汉代儒学传播的时代特征	扈晓红 70
流动的宋词	
——浅析宋词的传播	王文萧 76
近代报刊白话文化的嬗变趋势与内驱机制	王炎龙 84

·传播教学研究·

微格教学在教师教学培训中的实施	刘 诚 91
-----------------------	--------

电视节目制作新技术探讨

- 数字图像合成技术与虚拟演播室 洪登武 97
- 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与新闻传播教学 黄 晨 105
- 略谈“读图时代”与高校摄影教育 陈小德 109

·体育新闻理论·

- 从传播学把关人理论看体育新闻报道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原则 任广耀 115
- 对现代竞技体育成为体育新闻报道主体的原因探究 张业安 122

·纪录片论坛·

纪录片——主流与边缘之争

- 关于纪录片的一组笔谈 李同兴等 128
- 官方与非官方纪录片的艺术表现 叶 田 128
- “雅俗”之辨与当下的纪录片创作 肖海鸥 130
- 个性可以“审丑”而社会不能“审丑” 刘 俊 132
- 先大众化再多元化 张 歌 133
- 建设多元与主流的健康生态 陶彬彬 135

·电影学理论·

- 新时期中国电影审美形态的嬗变与创新 郭望泰 137
- 电影学类型理论
- 西方电影理论笔记之一 黄文达 147
- 宽银幕电影的空间意识
- 电影媒介技术层面开掘怎样影响其艺术形式的表现 沈嘉熠 159
- 论色彩在电影中的表现意义 邹 建 168

·主持艺术研究·

- 论节目主持人的风格展现(下篇) 王 群 张 梅 176
- 试说中介在社教节目主持人的作用空间 沈慧萍 186

·电视节目研究·

把握 综合 表达

- 谈电视专题节目编导应具备的业务能力 朱贤亮 192

自恋·掠夺·寄生

- 多元文化语境下古装电视剧的文化品性 钱春莲 199

雾里看花 水中望月

- 透视电视节目娱乐化、世俗化趋向 杨海燕 207

·研究生园地·

- 综艺娱乐节目的文化多元性 杨京姪 212

- 从三十年代电影批评反省当前中国电影批评 肖 路 217

·学术沙龙信息·

- “新媒体传播与民俗文化流变”学术沙龙综述 225

用影像记录上海民俗:《上海记忆》第1集《奉贤滚灯》拍竣

-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举办“上海民俗影像的记录与传播”学术沙龙 227

- 附:《上海记忆:民俗民间艺术专题纪录片》第一集《滚灯印象》解说词 229

- 《传播学研究集刊》理事会章程 233

- 《传播学研究集刊》征稿启事 236

对阅听人实证传统和批判传统的思考

童静蓉

【内容提要】本文对英美阅听人两大研究传统结合相关的研究成果作了比较分析,首先从文化哲学背景以及认识论的层次探讨了实证传统和批判传统之间的根本分歧以及各自的特点,其次分析了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两大传统的一些方面出现的融合迹象,从而指出两大传统之间有根本的分歧,但这些分歧并非绝对。作者是留学英国 westminster 大学传媒艺术学院的媒体与传播学博士,文章给我们带来了欧美学者对实证传统与批判传统最为新鲜的看法。

【关键词】阅听人研究 实证传统 批判传统

【作者简介】童静蓉,英国伦敦大学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体与传播专业博士。

导 言

美国和英国的阅听人研究传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前者通常被认为是行政或者实证传统,而后者则是文化批判传统。大体上,我们能够在方法论、研究目的、研究问题、认识论、文化和哲学理论背景,甚至研究者的政治取向上发现两个传统之间的分歧所在(Ang, 1989; Melody and Mansell, 1983; Slack and Allor, 1983; Smythe and Dinh, 1983)。然而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两个国家阅听人研究都出现了变化和发展。面对这些改变,学者们根据他们对两个传统之间分歧本质的不同理解得出了不同结论。一些学者,像斯克若德(Schröder, 1987),认为70年代中后两个传统走向融合,分歧开始消除。但像安(Ang, 1989)和其他很多学者却对这种融合观持批评态度。西方学术界在这个领域上出现了争执。

分 歧

两个传统之间的不同点表现在很多方面。如果将两者之间的分歧简单地一分为二,分歧则可以被看成是科学对不科学、量化对质化、自然或社会科学对人文科学、客观对主观、事实对感觉(LittleJohn, 1996)、解放对压抑科学(Hamelink, 引用在 Melody and Mansell 的文章中, 1983)。用麦奎尔(McQuail, 1994)的话来说,美国阅听人研究属于行为传统,而英国属于文化和接收传统。而斯克若德(Schröder, 1987)认为是“社会科学典范”和“批判典范”。无论是什么名称,核心的分歧源于文化和哲学理论背景以及认识论上的不同。不同的文化哲学理论背景和认识论导致了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者的预定立场,研究问题的选择,以及研究方法。

像所有其他的学科一样,阅听人研究无疑有它自己的在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理论来源。20 世纪初的政治纷乱加上涌现的消费工业和市场系统催生了美国的阅听人研究,这同时也是世界上阅听人研究的开始。然而英国的阅听人研究只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事实上确切地说,直到 80 年代英国才形成更为明确系统的研究传统。文化和时代的差异以及外在因素赋予这两个传统以不同的研究目的,这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分歧所在。

在文化和哲学理论上,五大主要原因导致了美国的行政/实证/行为传统。第一是美国自然科学的成功提倡实证主义,提倡一种对待研究的科学态度和对事实和数据的需求与强调。第二是社会背景。20 世纪 20 年代当美国学术界将目光投向阅听人的时候,大众社会对大众对媒体开始变得非常依赖。后者对前者有很深的影响力。在那个时候,人们被看成是无力的个体组成的“大众”(mass)。他们很容易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甚至被理解成被控制,被分解和被塑造的阅听人(Ewen, 1983)。特别是在 30 年代,在德国的对法西斯的恐惧加深了对媒体作用的恐惧,换句话说是对宣传的恐惧。在那个特殊时候,宣传研究在对“敌人宣传”以及“我方宣传建构”的分析的需要下兴盛起来(Ewen, 1983)。第三点是商业需求。在市场的需要下,商业公司需要了解阅听人特征,例如人口特点。第四,美国媒体私有化带来了对最大化“高质量”(quality)阅听人这个问题的思考。最后一个原因是新媒体的出现,例如有声电影,使得人们想知道这些新媒体对阅听人产生的效果,学者们也想向人们揭示一些社会问题。

然而服务公众并非实用传统的主要目的。相反地,“对想了解阅听人的商业、政府和其他机构”的服务构成了学术的倾向性和目的(Ewen, 1983)。像麦奎尔(McQuail, 1997)所说的,可能“最基本的目的上的分歧就是媒体工业目标的不同以及从媒体工业

方面来考虑还是从阅听人角度来考虑之间的不同”。政治、媒体集团和广告业的实用目的需要实用的阅听人研究。宣传家和商人需要知道媒体对阅听人有什么样的效果,并且希望能够预测这些效果从而控制阅听人。研究者们旨在迎合宣传和商业的目的,因此希望能了解并控制阅听人。换句话说,研究是希望维持和保护现有的社会体系和媒体体系,并非是改革或改变社会。

可是,从根源上,英国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不同的路。事实上这个不调和的情况在半个多世纪前就被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名重要成员阿当诺(Adorno)所目睹。阿当诺受拉杂斯菲尔德(Lazarsfeld)的邀请于1938年参加普林斯顿广播项目(the Princeton Radio Project)的研究。这个项目旨在分析美国阅听人行为和态度。然而不久,阿当诺就发现他的批判思想和商业服务的实用目的格格不入,而且他还不满意调查和收集数据的实验方法。在离开这个项目一年以后,他这么解释道:“自然在普林斯顿项目框架中很少有空间可以做社会研究。洛克菲勒(Rockefeller)基金会的章程特别规定调查必须在美国商业广播体系里进行。这意味着体系的本身,文化和社会结果以及社会和商业欲设立场不能被分析……”(Adorno, 1969: 343, 引用在Slack and Allor的文章中。)

像实证主义扎根于美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以及文化研究深刻地影响了英国文化批判阅听人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推崇批判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受到马克思主义以及对社会现象作质化和哲学分析的深刻影响。批判理论将媒体产品看成是霸权和其他社会经济力量控制下的产物。文化被看成是各种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马克思主义认为媒体是一个统治阶级用来潜移默化地培养意识形态的工具。用阿尔图赛(Althusser, 1971)的话来说,媒体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阅听人被看作是几乎完全臣服于媒体中的意识形态之下。容易受到影响的阅听人,特别是“工人阶级”,因为他们受教育程度低而且他们的工作又累又不需要思考,他们没有能力保护他们自己不受宣传和操控的影响(McQuail: 1997: 13)。因此这一阶段阅听人研究的焦点是工人阶级。无论是对工人阶级还是后来对女性的关注,这些研究的目的在于揭露权力的压迫本质。至于文学批评,早期文学批评研究已经开始在分析中使用符号学,但其仅仅关注文本(text)的力量,忽略阅听人这方面的因素。但是受到60年代接受美学和结构主义的影响,那时候出现的零星的阅听人研究强调文本的意识形态对读者的影响。到了70年代后结构主义盛起,学者们开始意识到文本的力量存在于阅听人解读的过程中。这意味着阅读活动加入到文本意义的建构中。这个转变也将学者们的眼光从对文本里意识形态影响的强调转向了阅听人的解读活动。此外,英国的文化研究引导阅听人研究关注起大众文化以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及表现。因为在那个时候,就像美国当初兴盛对媒体效果的关注一样,英国开始担心大众文化带来的影响。另

外,除了理论背景外,英国的媒体体系也影响到了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本质。不像美国的媒体体系完全私有化,英国依然有不受到广告干扰的公共媒体体系:BBC。公共媒体体系的存在希望媒体研究者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公共和文化方面。英国学者希望通过批判性地研究媒体而批判社会。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推动社会发展或者改革。

自然,不同的研究目的影响到对阅听人的概念。英国阅听人研究将阅听人看成是市民(McQuail:1983),但美国传统却将之视为消费者或者商品。“很多北美学者作的分析都反复地将阅听人看成是‘消费者’”(Nightingale, 1996:4)。例如,驱使研究者去研究阅听人的其中一个动力是广告商有“一个明显而实用的兴趣,这一兴趣在于希望知道在可以投放广告的媒体上阅听人的数量有多少”(Websteretal, 1997)。这些研究的确是服务于广告商的。用达拉斯·斯麦赛(Dallas Smythe, 1981)的话来说,媒体机构在从事一项将“阅听人送给广告商”的生意。另外美国传统认为阅听人是被动的,在媒体的影响下容易受到影响的。然而,将阅听人看成是市民的概念却符合英国阅听人研究的文化批判传统。这一传统认为阅听人是主动的,并研究作为市民的阅听人的解读过程。

除了文化和哲学理论上的差别之外,认识论上的分歧是决定研究方法和研究者所处位置的另一个本质因素。哈默斯雷(Hammersley, 1996:164)认为质化和量化研究之间的分歧是认识论争论的关键。认识论上现实主义(realism)的哲学理念导致了美国行政典范里的量化研究,而理想主义(idealism)使得英国传统采用了质化研究(Hammersley, 1992)。现实主义将世界看成是客观的,强调能够找到并能测量真理。而理想主义,则采用相对的观点,它认为真理是通过我们对世界的经验而得到的,而且对我们看到的事物的解读的强调多过对事物本身的强调。因此,质化方法的目的在于在没有预定立场的情况下,了解世界并了解意义的建构过程。而量化方法却是证明假设的成立,并关注因果的“解释”、“控制”和“预测”的行为(Pauly, 1991)。而且,研究者的立场在这两个研究方法中也不一样。量化研究中,试验者通常和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来保证结果的客观公正,而质化研究者通常会置身研究对象中间(Creswell, 1994)。

因此,研究方法是英美两个传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歧。一方面,美国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赋予阅听人研究以实验的特征。这旨在解决实际问题,而非是批评研究社会。研究是在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者们尽力寻找事实和数据。他们通常会设定一个假设,然后用实验结果支持或者证实这个假设。研究者们着重于研究传媒效果和对阅听人行为、态度,和心理上产生的作用。所以实证传统也被称为效果研究。

美国实证阅听人研究上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的“盘恩基金研究”(Payne Funding Studies),这也被看成是效果研究的开端(Newbold, 1995)。20年代的有声电影的出现对年轻人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家长的担心。在这场有名

的研究案例中,研究者用量化方法进行了实验调查,证实了家长们的担心。“盘恩基金研究”以科学精确而著名,这对阅听人研究的影响非常大。美国接下来 30 年的传播研究都把注意力放在媒体效果上。“几乎每个严肃的效果研究都是阅听人研究”(McQuail, 2003)。媒体效果研究也被解释为行为主义者所推崇的“刺激—反应”模式。这一模式假设阅听人会在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上对媒体产生的刺激发生反应。研究者们要去发现和测量这个效果以及阅听人态度和行为上的反响和改变。

然而,媒体效果研究并非一成不变的,其从 20 年代到 60 年代经历了三个阶段,这段漫长的历史同时也证明了美国实证研究的实用目的以及发展。第一个阶段是从 20 年到 40 年代,这段时间里媒体效果被认为是强效果而且是万能的。而阅听人被看成是被动的靶子,非常容易被媒体的强效果所影响。这也被称作是“皮下注射论”(the hypodermic model),比如拉斯韦尔(Lasswell)在 20 年代做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Propaganda Techniques and the World War)。第二阶段从 40 年代到 50 年代,认为媒体效果是有限的。拉扎斯菲尔德在他对 1945 年选民活动的研究中发现,人之间的影响力要比媒体影响力来得强。在根据 1945 年收集来的数据而写作并发表于 1955 年的《个人影响》(Personal Influence)中,拉扎斯菲尔德和凯兹(Lazarsfeld and Katz)指出形成态度和观念的主要影响力来自于“意见领袖”而不是大众媒体。尽管阅听人研究仍然符合线性因果模式,这时候研究者们已经开始注意到阅听人的差异,并开始认为阅听人是活跃的了。此外,他们提出了“二步流”的概念,这被认为是将“研究的重心从实验室的个体身上”转向“作为放在社会环境下的一个或者几个团体的成员的个体上”并很大程度地拓展了“研究设想”(Newbold, 1995: 119)。贺富兰(Hovland)和他的同事在二战时所作的实验研究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导致了“个体差异论”。克兰坡(Klapper)也同意媒体效果是有限的。他认为大众媒体仅仅是加强了阅听人已经存在的态度而不是改变了他们的态度。到 60 年代则出现了第三阶段“媒体效果重现”阶段。然而无论如何变化,效果传统从总体上来说始终是用量化方法来测量媒体效果和阅听人的反应。

与美国阅听人研究上的实证主义和量化方法相对,英国阅听人研究者更喜欢使用文化研究以及质化方法。英国学者,甚至欧洲学者,批评效果研究过于简单化以及相同化阅听人,而且反对将阅听人看成是被动的观点。意义、意识形态以及文本—读者的关系是他们的主要研究兴趣所在。质化研究方法,比如说符号学、文本分析和 80 年代的民族志法,是他们喜欢使用的研究方法。此外,他们还强调阅听人阅读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

英国文化批判阅听人研究传统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Moores, 1993)。然而更准确地说,直到 80 年代英国在阅听人研究上才有了明确的传统。在 80 年代之前,学

者们不系统地研究文本里的意识形态对阅听人的影响。像上文所说的,法兰克福学派深刻影响了英国阅听人研究的文化途径。这一学派认为阅听人是被“虚假意识”控制的受害者(McQuail:1983)。在文化批判传统的早期,研究重点依旧放在文本上,这被称为“文本决定主义”(text determinism)(Moore, 1993)。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在传播过程中研究媒体文本的意识形态。霍尔(Hall, 1973)在“编码/解码”模式(encoding/decoding model)中用意识形态分析来代替效果研究。这个模式对英国阅听人研究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英国研究者意识到阅听人的活跃性,并站在阅听人这一边来做研究。阅听人活跃性这个概念是从使用和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中来。另一方面这个模式强调了议题设置的作用。议题设置源自效果研究,但其目的依然和意识形态有关(Morley, 发表时间不清)。此外,英国学者们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文本和意义上,并特别关注一些特定群体阅听人。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这些阅听人的特殊群体,特别是那些来自工人阶层或者草根阶层的群体,吸引了英国学者们的兴趣(Nightingale, 1996)。英国阅听人研究学者开始研究特殊群体阅听人对特定媒体讯息的接收分析(reception analysis)。因此,文化批判传统强调文本以及阅听人解码的方式和过程之间的关系。文本的意义只有在阅听人解码后才能得到体现。尽管这一过程仍然被意识形态所控制,但这已经是个开放的空间了(Hall, 1980)。霍尔提出了三种阅读方式:优先阅读、协商阅读以及对立阅读。这三种阅读模式的提出使得阅听人研究重点从意识形态决定论转向意义的多重论(pluralism)。而且这更是在80年代引起了新阅听人研究的出现。这一新趋势分成两个方向:一个是莫利(Morley)的民族志法(ethnographic approach),另一个是费斯克(Fiske)的“符号民主”(semiotic democracy)。这里谈的是前者。

此外,英国阅听人研究者将注意力放在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以及寻找阅听人的经验和感受,而不是像美国传统那样喜欢事实和数据。80年代他们用民族志法在人文科学背景下作研究。1980年被看成是阅听人研究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大卫·莫利(David Morley)的《全国观众》(The 'Nationwide' Audience)使得英国传统脉络明确起来。从此,这一研究传统通常选择的研究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不同背景和经验的阅听人在媒体文本中如何解读发现意义,二是阅听人在不同环境里使用媒体的日常经验。

融 合

尽管英美阅听人研究传统之间存在这么大的分歧,但是两国的很多学者都提倡在方法论和理论层次上填补分歧。早在1938年,拉扎斯菲尔德介绍阿当诺去普林斯顿广

播项目,希望阿当诺帮助“发展欧洲理论和美国实证主义之间的融合”(Lazarsfeld, 1969: 323,引用在 Slack and Allor 的文章中)。后来,效果研究者意识到“在大众媒体‘效果’上的三十年的方法研究带来很少的理论和持续的发现”(引用在 Schröder 的文章中, 1987:12)。在他的一篇期刊文章里,斯克若德(Schröder, 1987)认为很多英美学者将用“实用途径”来分析“美学物体”的做法看成是必要的。另外像美国的拉尔(Lull)和凯兹(Katz)以及英国的杰森(Jensen)和布拉姆勒(Blumler)一样,很多学者认为有必要有种既是批判的也是实用的接收理论。而且学者们认为的确存在很多能够使两个传统融合的先决条件。南廷格尔(Nightingale, 1996)在她的书中分析了几个两个传统共同拥有的中心概念。活跃的阅听人、心理分析,以及群体等概念都被列其中。

很多学者指出两个传统之间的分歧正在缩小,在一些方面的确出现了融合。例如,卡伦(Curran, 1990:135)认为出现了“新革新主义”。学者们认为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方法论和阅听人概念上面。两个阵营里的很多学者开始将质化分析与量化调查相结合。然而,这些变化不只是在方法论上。不仅是批判典范而且实用典范在阅听人研究里开始寻求文化的意义和美学物体。这些变化着的研究倾向也和变化着的阅听人概念相互作用,使得英美学者对阅听人的概念在某些程度上出现了交叉。

两大传统出现融合的转折点出现在 70 年代,转变的迹象在四类阅听人研究里面体现出来。它们是培养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使用和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议题设置(Agenda Setting),以及民族志法(Ethnographic)阅听人研究。大体上来说,融合出现在方法论、转移到文本和接收上来的重点,甚至还有是哲学理念这三个方面。

从 70 年代起,活跃的阅听人这个概念被英美两国的研究人员所接受。事实上在 70 年代使用和满足^①理论之前,美国研究人员已经开始将阅听人作为群体或者属于不同社会群体的个体来研究。尽管默顿(Merton, 1964)的大众说服(Mass Persuasion)以及拉扎斯菲尔德和卡兹(Lazarsfeld and Katz, 1964)的个人影响力(Personal Influence)依旧为了指出在阅听人团体中的意见领袖的效果,但这几个研究实际上开始将阅听人当作某些团体并意识到阅听人的多样性,因为他们发现了二步流的存在。使用和满足理论(Katz et al., 1974)事实上将被动的阅听人概念在 70 年代转变成主动的活跃的阅听人。除了这些美国的研究,对媒体消费使用使用和满足方式进行的研究在英国的杰·布拉姆勒(Jay Blumler)、詹姆斯·哈洛伦(James Halloran)和莱斯特传媒研究中心的研究中出现(Morley, 1989)。

使用和满足这一理论颠倒了效果研究中媒体和阅听人的关系,认为要考虑“人们对媒体作了些什么”而非是“媒体对人们做了些什么”(Moore, 1993:7)。效果研究的历史过于强调媒体对阅听人的效果。研究者们测量媒体效果和阅听人行为上的变化。但

是,使用 and 满足理论并不属于简单的刺激-反应模式,而是将重点放在阅听人的社会和心理需求的决定作用上面,并推进了活跃的阅听人的概念。这样一来,要考虑的问题不再只是媒体对阅听人的作用,而是阅听人对媒体效果起到的作用(Halloran, 1970)。凯兹等人(Katz et al., 1974:22)认为当阅听人接触到媒体讯息的时候,他们在做“对大众传播的文化意义的价值判断”。因此,使用 and 满足研究被看成是一种进步(Curran, 1990)。像莫利(Morley, 1989:17)指出的那样,“使用 and 满足理论这个视角发展了一个关键的东西,那就是阅听人对媒体的反应和解释的可变性”。斯克若德(Schrøder, 1987)甚至提议将该理论当成是一个联合质化分析和量化调查的阅听人研究的出发点。

但是在使用 and 满足理论里,除了表现出的融合的迹象,一些不同点还是存在。美国的研究大多将重点放在阅听人在消费媒体时候的功能性的心理状态。而英国研究认为阅听人消费媒体的目的是表现主体性以及从媒体讯息里建构意义(Moores, 1993)。

除了阅听人概念的改变,研究里“质化和量化研究方法的结合”是融合的另一表现(McQuail, 1997)。研究方法开始混合:美国学者开始使用质化方法而英国研究人员开始采用实验方法,特别是实地调查(fieldwork)。美国研究者在“知觉心理和符号互相影响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质化方法(Nightingale, 1996)。在 1987 年的文章里,斯克若德(Schrøder)用诺曼(Neuman)作的研究来作为混合方法的研究例子。为了获得文化意义以及阅听人经验的数据,诺曼(Neuman)在研究中使用了质化和量化两种方法。

另外一个例子是培养分析或者叫做文化指示(cultural indicators)。格伯纳(George Gerbner)和他的同事在 60 年代末首先进行了“培养者(cultivationist)”研究。格伯纳等人(1994, 2002)认为电视对暴力过多的表现影响了阅听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而不是仅仅使容易受影响的阅听人的暴力行为增长。培养分析理论显示了电视有长效果。经常看电视的人很容易“用电视镜头所呈现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来看待这个‘真实’的世界”。

学者们认为这个研究已经不属于美国主流阅听人研究传统。主要原因有二。一为研究使用了文化视角和质化方法去分析电视阅听人。第二个原因在哲学的层次上。研究转向了意识形态,并将电视看成是一种传播和巩固意识形态的一个工具。培养理论加强了文化的指示作用,并提高了阅听人在“培养”的作用下对意识形态的“优先阅读”的可能性。这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因此,培养分析被看成是两个典范转折的一个转折点。

同样的,认为议题设置理论背叛正统的原因也是和意识形态有关。麦考姆等人(McCombs et al., 1994, 2002)指出新闻媒体设置议题让阅听人思考甚至如何思考某些特

定的事件而不是直接告诉阅听人媒体的观点。用这种方式,媒体实质上突出了某些事件而且告诉阅听人哪些是重要的是值得思考的。公众的视角和评判标准会因此改变。这其实是意识形态在设置议题。

英国学者们使用实验方法体现在接受分析或者说是民族志法阅听人研究上。接受分析在阅听人研究中应用了民族志的方法。这一方法给文化阅听人研究传统带来了实验的方法并使得接收研究发展了一种融合质化和量化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通过用深度调查或者田野观察获得的实验数据,特别是个体在接收过程中的经验和感受,并且研究阅听人对媒体讯息的活跃的选择和解释(Morley, 发表时间不清)。

1980年的三个有名的阅听人研究试验—莫利的《全国观众》(the Nationwide Audience)、拉尔(Lull)的《电视的社会用途》(the Social Use of Television)以及豪伯森(Hobson)的《家庭主妇和大众传媒》(Housewives and the Mass Media)——标志着将民族志法应用于阅听人研究的开始。这样一来,“似乎获得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共鸣,这是持有不同认识论的学者的共同点”(Ang, 1989:96)。民族志法,作为一种文化分析的实验方法,将文本分析和田野工作结合起来了,这是两个传统的交叉点。大部分民族志阅听人研究在80年代展开,而且事实上,民族志法不仅被英国学者所使用,而且也被美国研究人员采用。比如美国的Katz and Liebes (1984)的《从前,达拉斯》(Once Upon a Time, In Dallas)和英国的Ang (1985)的《观看达拉斯:肥皂剧和情节剧的想象》(Watching Dallas: Soap Opera and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因此80年代被看成是阅听人研究中的“新阶段”(Nightingale, 1996)。很多批评家,像罗森仑(Rosengren),认为接收分析或者民族志法是两个传统的一个融合。

但是我们能不能就凭着这些变化来得出实证和批判传统有股融合的趋势这样一个结论呢?答案是否定的。除了上面谈到的融合点外,两个传统之间依旧存在更多的不同。像上文所讨论的,两个传统之间的分歧源自认识论和文化、社会以及哲学背景。英美两国研究者不同的倾向性和实验目的阻止了进一步的融合。很多研究者不同意融合这个观点,比如说安(Ang, 1989)和斯莱克和阿勒(Slack and Allor, 1983)。麦奎尔(McQuail, 1977)明确断言道,尽管在“质化和量化方法的联合”上出现了一些融合,但是“两个传统之间还存在着骨子里的哲学和概念化的区别”。安(Ang, 1989)强烈地反对最近出现的认为先前对立的“批判”和“主流”阅听人研究传统出现了“新的一致”的论断。她认为认识论概念根深蒂固的区别使得融合变得不可能。斯莱克和阿勒(Slack and Allor, 1983)有类似的观点。他们也认为认识论以及哲学的分歧是两个传统之间的中心区别,这种本质的分歧剥夺了所有的可能性。因此很难下结论说两个传统正朝着融合成一个的方向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如果说两个典范之间是绝对的分裂而忽略两者之间

出现的某些方面的融合点也是不正确的。

结 论

这篇文章讨论了美国 and 英国阅听人研究中的分歧。从一开始,英国传统就和美国传统非常不同。美国阅听人研究是行政典范,它通常使用量化方法,并有功利性的目的。它也被称为是效果研究。这一传统需要从实验中得到的媒体对阅听人的作用的客观科学的数据。通常来说它认为阅听人是被动的。阅听人研究是为商业机构,政府以及其他组织服务,而且研究的目的在于证明假设,控制阅听人以及保持当权者的权力。相反的,英国批判传统使用质化方法并用非科学的文化方法来分析阅听人。这一传统相信阅听人是主动地,它更多地关注阅听人这一边。这两者之间的分歧源自认识论和社会文化哲学背景。

然而从 70 年代,特别是 80 年代后,两个传统都出现了发展和变化,在一些方面出现了融合。在方法论、阅听人概念以及有时甚至在哲学上出现了变化。使用和满足、培养分析、议题设置以及民族志法阅听人研究这四个方面表现出了融合的迹象。但是与此同时,分歧依然存在。因此目前两个传统之间有差异处也有共同点。分歧是存在的,但不是绝对的。

参 考 文 献

- [1] Adorno, T. W. (1969) '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in D Fleming and B.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 - 196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Belknap, page 343.
- [2] Ang, I. (1989) *Wanted: Audiences. On the Politics of Empirical Audience Studies*, in Seiter, E. and Borchers, H. et al. ed. *Remote Control: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3] Ang, I. (1985) *Watching 'Dallas': 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 [4] Althusser, L.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Althusser, L., *Lenin and Philosoph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
- [5] Creswell, J. W. (1994).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6] Curran, James (1990). *The New Revisionism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Reappraisal*, i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ume 5 Numbers 2 - 3 June, page 135.
- [7] Ewen, S. (1983) *the Implications of Empiricism*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Summer, 1983.
- [8] Gerbner, G. and Gross, L. et. al. (1994, 2002). *Growing up with Television: Cultivation Processes*, in Bryant, J.